

# 论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话语创新方法

金小方

(合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0601)

**摘要:**现代新儒家在中西文化、古今文化激烈冲突的环境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采用返本开新、借西释中、知行结合等理论建构方法,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返本开新的方法有助于深入分析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协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借西释中的方法有助于认清中西文化的特质和借鉴西方文化的资源。知行结合的方法有助于坚守儒家作为生命的学问的特色。这些理论方法给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直接的参考。

**关键词:**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借西释中;知行结合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4-0001-07

现代新儒家是一个以继承儒家文化精神为己任,在融汇中西中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学术派别或学术群体。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既面临着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冲击,又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压制,现代新儒家诞生的使命就是要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现代新儒家承担的使命是要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建构符合近代中国时代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既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要具有时代性、现代性。现代新儒家们采用的理论建构方法有返本开新、借西释中、知行结合等,这些理论方法让他们严守了中国文化、儒家文化的立场,并在全面借鉴了西方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情况下,积极探索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路径。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建构方法对当前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 一、返本开新

借鉴西方文化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他们对于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存在着分歧。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将中国传统文化看成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主张严厉批判和彻底抛弃那些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核。现代

新儒家则主张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吸收借鉴西方文化,返本开新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

返本开新是现代新儒家重建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唐君毅指出:“中国人文精神之返本,足为开新之根据,且可有所贡献于西方世界。”<sup>[1]自序<sup>3</sup></sup>他所讲的“本”指中国文化,着重指“宋明儒者之精神”<sup>[1]自序,7</sup>。“新”指人文世界的全幅开展,包含宗教科学艺术文学哲学之大盛。从整个现代新儒家群体看,他们所返之本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是从思想流派角度看,现代新儒家以儒家为主、兼及佛道为本。现代新儒家所返之本多指整个的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三家为主,兼及诸子百家。梁漱溟自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sup>[2]第八版自序,19</sup>。他在比较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时提到“我研究知识所用的方法就是根据于唯识学”<sup>[2]101</sup>,他以唯识学的现量、比量、非量三个概念与现代西方哲学方中的感觉、理智和直觉相类比。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在思想旨趣上归宗陆王心学,他受到唯识论和因明学的影响,重视概念和理论的逻辑分析。方东美曾描述他自己:“从家庭来说是儒家,就气质而论是道家,在宗教启示方面属于佛教,此外还曾接受过西方的知识训练。”<sup>[3]55</sup>他在阐述中国哲学精神时着重分析了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和宋明新儒家四大传统,体现了统摄百家的包容性格。

收稿日期:2022-02-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代新儒家哲学话语创新研究”(19YJA720009)

作者简介:金小方(1979—),男,安徽安庆人,哲学博士,合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不立门户、兼融并包是现代新儒家的特色,儒家思想始终是他们的思想主干,尤其是从以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一系的狭义现代新儒家来看,他们有强烈的道统意识。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有一脉相承的统绪,自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以来的文化上始终一统相承。以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们在坚守中国文化、儒家文化立场的基础上,承认世界多元文明的世界格局,超越了道统论的卫道心态。

二是从思想内容角度看,现代新儒家主要以儒家心性义理之学为本。现代新儒家们都重视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揭示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熊十力窥见近世哲学不讲本体,将“万化大原、人生本体、道德要底一概否认”<sup>[4]19</sup>,因此撰写《新唯识论》的目的是要“究万殊而归一本,要在反之此心”<sup>[4]3</sup>。他针对《周易》中的“乾知大始”,指出“乾谓本心,亦即本体”<sup>[4]19</sup>,就续接上了孟子道性善、《中庸》讲天命之谓性、宋儒论天人合一和仁者与万物同体,进而形成了人人都可由体证内在的乾元性海而上证天道的思想观念。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四人1958年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指出:“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sup>[5]567</sup>方东美晚年力作《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亦是“独采形上学途径,欲以直探主脑及其真精神之所在”<sup>[6]76</sup>。唐君毅在思想内容上则提倡宋明儒者的精神,认为“一定要讲性与天道,以深植本根,主静主敬,以求凝敛精神,一定要辟佛老,以树立儒学之统”<sup>[1]83</sup>,才能真正发扬民族文化的生命精神。

三是从经典著作角度看,现代新儒家主要以四书五经为本。梁漱溟说中国的形而上学“大约都具于周易”<sup>[2]153</sup>,其中心意思是调和。熊十力认为《周易》是儒道两家所宗,他的《新唯识论》评判佛教空有二宗大义,最后归宗大易,他在《体用论》中更明确地宣示宗主《易经》,以体用不二立宗,《原儒》一书也是宗主《大易》,贯穿《春秋》。马一浮提出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sup>[7]12</sup>的观点。他所讲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所谓“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具体指六艺可以统摄诸子学说,可以统摄经史子集四部,可以统摄西来一切学术,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宗教统于《书》《礼》。方东美在探讨中国上古哲学,尤其是原始儒家的起源问题时,特

别注重《尚书·洪范》和《周易》经传,《易经》中的创生宇宙论与人性崇高论是方东美哲学思想的根本精髓所在。牟宗三主张以《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儒家生命智慧的根源。

如果以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的狭义现代新儒家而言,返本开新即从儒家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等新外王。如果依广义的现代新儒家论,他们所开之新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新概念。现代新儒家在儒家仁、心、性、内圣外王等概念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自我、道德理性、内在超越、外在超越、良知坎陷等新概念。二是新理论。现代新儒家建构的新理论体系主要有新心学理论体系和新理学理论体系。三是新文化。梁漱溟在他提出的文化三路向理论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基础上,指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sup>[2]241</sup>,具体的做法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化,“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sup>[2]255</sup>,恢复儒家以性善论为主要内容的人生思想和以调和、平衡、中庸为特征的人生态度。牟宗三则提出了第三期儒学的观点。

返本开新的方法论意义主要是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如果落实在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上,就是从返儒家心性之本开出民主与科学之新,针对这一说法学术界质疑较多。因为儒家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流派,不可能代替科学家去从事科学研究,也不可能代替政党去管理国家,更不可能提供一套现代经济生产的组织模式。其实,现代新儒家所讲的返本开新只是从理论上来证成现代化,证明儒学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还能成为现代化的精神支撑。返本开新的方法论的主旨,是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现代新儒家全面深入分析总并结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特质,揭示了中国文化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思想流派、理论体系和经典著作,并运用现代语言和逻辑理路梳理出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习近平指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sup>[8]</sup>。挖掘和阐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必然要讲清楚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精神追求,讲清楚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现代新儒家所走的返本开新之路正体现了文化建设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精髓所在。

## 二、借西释中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为了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捍卫中国文化的地位而兴起的,“融贯中西,平章汉、宋”<sup>[4]556</sup>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方法。现代新儒家们对西方文化非常了解,张君勱、冯友兰、贺麟、方东美、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都曾留学西方,尤其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他们长期在西方高校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在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现代新儒家既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移植西方文化的道路,又反对国粹主义,反对固步自封地坚守中国传统文化,而主张通过比较、批判而借鉴的路径,采西方文化之长而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

第一,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揭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寻找进而试图确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现代新儒家的中西比较研究既有在宏观上对中国、西方、印度等的比较,又有微观上中西思想观念的比较。

从宏观比较看,梁漱溟比较了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他提出了文化三路向理论,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他由此指出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因为路向的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必然要走上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文化三路向理论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确立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和前途。方东美早年留学美国,他于1931年发表的《生命情调与美感》一文比较了希腊人、近代西洋人和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审美情趣,1936年出版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比较了希腊和近代欧洲的生命精神,1937年发表的《哲学三慧》一文比较了希腊、欧洲和中国三种不同的智慧类型,以一种诗意的文化哲学诠释系统地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唐君毅比较了西方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四大文化系统的学术文化发展的阶段与特点,他指出中西古代文化在开始点“一重历史,一重自然哲学,一尚德性与仁,一尚智与知识”<sup>[1]466</sup>,西方文化是人类精神之分散展开

的成就,中国文化是人类精神之凝聚翕合的成就,提出“中西学术文化之当谋互相取资以开新”<sup>[1]476</sup>,从而指出了中西文化互相借鉴发展的方向。

从微观比较看,熊十力比较了中西方学者关于心的认识,他指出:“中土学者,大抵皆从伦理实践上纯粹精诚、超脱小己利害计较之心作用,以认识心体。……彼所研究之范围原不涉及本体,其操术以分析测验,亦不待反观自识、操存涵养之功。”<sup>[9]81-82</sup>儒家孔子、孟子至宋明理学都着重从形而上学层面、本体论层面来讲心,是连着道德修养论来讲心性本体,不同于西方哲学主要从认识论层面来讲心。再如关于生命的认识,他指出:“柏格森《创化论》的说法,不曾窥到恒性,只妄臆为一种盲动,却未了生化之真。”<sup>[10]397</sup>柏格森生命哲学所讲的生命只是一种习气暴流,只揭示了生命的运动不息,而熊十力新唯识论所讲的生命本体则是宇宙的大本大源,具有清净的本性,这种生命具备了道德的属性。可见,熊十力借鉴西方哲学是既有吸收又有批评,他肯定了西方生命哲学关于生命创生不已的过程分析,同时也比较了其中非理性的盲动一面与中国生命正本清源、善始善终的道德品格的差异性,突显了中国生命观的特点与优长。

第二,批判西学,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四人1958年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批判了三种世界人士研究中国文化的动机:一是耶稣会士的传教动机,二是出于对中国文物的好奇心,三是出于政治与国际局势的现实动机。这三种动机都只从某一方面来研究中国文化,易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最突出的问题是不承认中国文化仍有生命力,认为儒学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与现代社会没有关联,如斯宾格勒认为中国文化到汉代已死,列文森提出儒学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已走向博物馆的观点,韦伯在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直接否定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则突出了儒家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威胁与挑战。针对上述观点,现代新儒家们给予了明确的反击,护卫了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和生命力。后继者如杜维明批判了列文森、韦伯的观点,指出

“亚洲工业地区在历史上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有密切的关系”<sup>[11]43</sup>。他以新加坡为例说明了儒家文化与亚洲地区经济的关系,论证了儒家文化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发展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模式,揭示了儒学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价值,同时也批评了亨廷顿的西方中心论观点,提出以文明对话取代文明冲突<sup>[12]76</sup>。

批判西方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新儒家们的共识。梁漱溟指出西方人秉持意欲向前的精神:“从他那向前的路一味向外追求,完全抛荒了自己,丧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sup>[2]218</sup>张君勱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sup>[13]151</sup>的恶果。科玄论战的实质正是张君勱“从哲学方法上划清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界限”<sup>[14]151</sup>,由此展开了对中国文化现代价值的大讨论。方东美《生命悲剧之二重奏》(1936年)一文揭示了希腊与欧洲两种不同的悲剧,指出在现代科学驱使下的欧洲思想主流表现出驰情入幻的趋势,科学理智驰骋宇宙,人类寄生其间未有着落,方东美称此为“抽象理智主义的心病”<sup>[15]292</sup>。欧洲人虽百折不回积极进取最终仍走向了浮士德悲剧的结局,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悲剧”<sup>[15]262</sup>。方东美在《哲学三慧》一文中称欧洲文化为“尚能文化”<sup>[15]304</sup>,驰情入幻,陷入理智的疯狂是其不足。如果说方东美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其弟子成中英则明确指出:“科学和技术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人类自身的物化与意义失落,不但会造成人类的毁灭,也会造成人类的精神贫穷与死亡”<sup>[16]409</sup>,这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

第三,借鉴西学,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现代新儒家群体注重借鉴柏格森、叔本华、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来学诠释儒学。

梁漱溟借用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生机主义诠释儒家哲学,他用柏格森的直觉来解释儒家的良知和仁,他指出:“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这种求对求善的本能、直觉,是人人都有的;……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sup>[2]161-162</sup>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理论的基础是他对生活本质的看法,他提出:“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sup>[2]51</sup>叔本华所讲的意欲是一种无法遏制的盲目冲动和本能欲

求,是邪恶的根源和痛苦之源,而梁漱溟所讲的意欲其实是一种本质为善的道德本体。因此有学者提出梁漱溟所讲的作为生活本源的意欲“实即柏格森所说的生命”<sup>[17]36</sup>,其实二者之间仍有本质区别。熊十力、方东美、牟宗三都曾借鉴过柏格林生命哲学来阐发自己的新儒学理论。

借鉴西方哲学理论、思维方法来整理、创新中国哲学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方案。诸如冯友兰对西方逻辑分析方法和新实在主义的借鉴,唐君毅对黑格尔哲学的借鉴,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借鉴,是现代新儒家借鉴西方哲学理论最鲜明的体现。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写作上建树最多,他的哲学史写作方法是“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sup>[18]245</sup>,借鉴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和逻辑分析方法,使中国哲学史具备了逻辑性。他按照西方哲学的基本逻辑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大部分内容梳理中国哲学史。他的贞元六书也是“以逻辑分析为基本方法,融合新实在主义与传统理学的产物”<sup>[17]97</sup>。唐君毅的《道德自我之建立》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为其最具创新性的两部著作,其中借鉴了黑格尔正反合的三段式论述方式,借鉴了“康德、黑格尔之理想主义之传统”<sup>[19]7</sup>,将人类文化看作是理性精神的客观表现。牟宗三将康德哲学作为诠释儒学的参考系,分析了儒学可以克服康德哲学的不足,揭示了儒学形上学超越康德哲学的一面,由此提出了“道德的形上学”“智的直觉”等现代新儒学的创新性概念,打通了儒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联系。现代新儒家们借鉴西方哲学概念来诠释中国哲学时,不自觉地受到西方哲学思维的影响,不免让人担心有将儒家内圣之学导向知识化的倾向,同时他们对西方哲学也存在着一定的误读,不管这些误读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引起了学术界的质疑。事实上,接受西学也好,对西学误读也罢,都是现代新儒学方法论的必然之选,是现代版的“六经注我”,唯有我明确了何为“我”,坚守了“我”之本色,才可谈哲学的推进和发展,现代新儒学的价值即在于此。

由于西方哲学历史悠久,流派众多,现代新儒家借鉴西方哲学有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成中英将现代新儒家借鉴西方哲学与文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为代表,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一切,往往只是凭感觉

来把握,而不曾真正理解”;第二阶段以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他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和诠释更加实在精密,但“他们与西方之间仍然缺乏完整的沟通和往返”;第三代以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他们“得以陶冶浸润于西方哲学思考中。他们主动与当代西方哲学产生的问题觐面,实际上已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sup>[20]297-298</sup>。这表明,现代新儒家借鉴西方哲学与文化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 三、知行结合

学术界关注现代新儒家,不但关注他们的治学,也关注他们的为人,这种将治学与为人同时考察正是中国学问的特色。儒学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从个人角度看,儒学是为己之学,思孟陆王讲反身而诚,强调践行尽性,为学的目标是为了做君子、成圣贤;从社会角度看,儒家的修身要走向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儒家理想推广到全社会。现代新儒家们在推动儒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有一定的知识化倾向,但他们仍保持了传统儒学的实践品格,他们在个人修养实践和儒学的影响社会两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从个人修养方面看,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思想家有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等。熊十力的学问强调证体,重视儒家反求诸己的圣贤之学。他既不主张纵欲,也不主张绝欲,认为“只要操存工夫不懈,使昭昭明明的本心常时提得起,则欲皆当理,自不待绝了”<sup>[21]513</sup>。他的发明本心的工夫主要包括量、保任、推扩等方法。熊十力的弟子、朋友关于他的治学与为人回忆评价甚多,其学生任继愈的《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一文对其人格修养记述全面而丰富,回忆了熊十力手舞足蹈的讲学情形,记述了熊十力在颠沛流离中不废讲学和关心学生成长的故事。任继愈指出:“不论对什么人,只要常到熊先生处,听他讲学,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他的‘学生’了。熊先生有一种气势,或者说有一种‘境界’把来访的人摄服了。”<sup>[22]43</sup>熊十力的言行处处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挚爱,对学问的自信、对学生的关爱和对朋友的坦诚,具有强烈的传道责任感。至于翟志成《长悬天壤论孤心》一文所讲的熊十力既贪且吝的各种生活行为问题,郭齐勇在《熊十力传》中有详实的辩驳,进一步证明了熊十力持守自己的一贯之道,其“立德与立言是一致的”<sup>[23]200</sup>。冯友兰晚年虽历经曲

折,但至九十高龄仍坚持《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其毕生追求真理的伟大胸怀值得敬佩。学术界以孔子所说的仁智勇三达德来评价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认为“徐是勇者型,唐是仁者型,牟是智者型”<sup>[24]353</sup>,简洁形象地刻画了三者的人格个性特征。

从现代新儒家的社会实践方面看,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也可谓是现代新儒家中的实干家。他认为“孔子之学全在乎身体力行”<sup>[25]34</sup>,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他关注思考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两个方面:为了了解人生问题,他不结婚,想出家;为了解决中国问题,他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京大学教书。梁漱溟自进入北京大学教书开始,中国问题在他的思考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更加充分地实践他的教育理念,他于1924年辞去北京大学教席,开始了乡村教育的实践。他认为教育青年不仅是教他们知识技能,更要“顾及到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sup>[26]41</sup>。他的教育实践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朝会。所谓朝会,即清晨静坐共读,梁漱溟即兴讲授心得<sup>[26]48</sup>。这种形式开始于1925年北京什刹海,后在河南、山东坚持多年。他在朝会上的讲话后出版为《朝话》一书。二是乡治。所谓乡治,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梁漱溟1928年在广东办乡村讲习所,1931年在山东省邹平县办乡建研究院。他提出:“讲学、搞学问要与做社会运动合而为一,不是单纯地在课堂上讲哲学,书斋里做研究,而是有言又有行,与社会改造融为一体,打成一片。”<sup>[26]50</sup>三是书院教育。梁漱溟一直希望复兴宋明人那样的讲学之风,他于1941年在重庆北碚将他主持的勉仁斋改办为勉仁书院,并请熊十力到此讲学。梁漱溟推广儒学的实践活动有一批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他提出的先农业后工业、乡村为本城市为末、以礼代法等乡村建设理念,注定无法取得成功,同时也暴露了早期现代新儒家守旧的一面。

办书院是现代新儒家们为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而致力于人才培养的重要实践。他们批判现代学校教育偏重于知识技能的传授,忽视身心培养,缺乏教育精神,于是大力推广书院教育,追求知识教育与人格教育相结合。马一浮于1939年担任四川乐山复性书院山长,熊十力、钱穆任讲座。复性书院以“养成儒家”<sup>[27]386</sup>为宗旨,设理学、玄学、义学、禅学四个讲座,因书院教学内容脱离实

际,发展艰难,真正开讲的时间不到两年,1948年停办。张君勱于1940年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1942年关闭。梁漱溟于1940年在重庆北碚创办勉仁书院,熊十力于1942—1945年到此讲学,后由于梁漱溟“奔走大局疏于经营”<sup>[28]685</sup>,经费不足而停办。唐君毅、钱穆于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新亚书院是现代新儒家所办的四所书院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所书院。新亚书院的《招生简章》指出:本书院“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务使学者切实了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sup>[29]3</sup>。唐君毅制订这一宗旨是为了以人格为中心的教育来弥补现代大学以课程为中心的教育的弊端,实现传统人格教育与现代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1963年新亚书院和另两所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当时各书院教学和行政均独立,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科教学改由大学统一管理,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最终被现代大学制度所湮灭。唐君毅强烈反对香港中文大学由联合制改为统一制,但终无济于事。从这一点看,现代新儒家发挥宋明儒者书院的讲学之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由于书院教育与现代社会大学教育分科、社会职业分工的发展趋势有着明显的差距,使得这些书院最后都难以为继。

虽然在社会实践层面,无论是他们的社会改良实践还是书院教育实践,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现代新儒家们在个人修养实践层面是成功的,他们努力践行了知行合一,保存了儒家作为为己之学和生命的学问的特色,他们毕生践行了“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他们的文化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值得敬佩。刘述先指出:现代新儒家努力阐扬的是“精神的儒家”,而且“精神的儒家如今有往学术转型的方向”<sup>[30]16</sup>,现代新儒家们主要是在大学从事哲学与文化的教学工作,他们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出版著作、讲学、办杂志、参加国际会议等,他们的影响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学术圈子。许多学者在批评现代新儒家时指出,儒学的现代价值只适合在人格修养和精神提升层面,让儒家来承担改造整个社会的工作是不合时宜的。

此外,现代新儒家哲学话语创新与理论建构的方法,除了返本开新、借西释中、知行结合之外,还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古代学术分为义理、考据、词章等科目,各种学问基本上都以六经

为根本。现代新儒家全面借鉴了现代西方学术分科,主要从哲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美学等学科相结合来推进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与话语创新,例如熊十力、牟宗三主要从哲学、宗教学的角度,唐君毅主要从哲学、文学的角度,钱穆、余英时主要从历史学、文献学角度,方东美主要从哲学、美学角度进行理论研究,实现了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融合与创新。

现代新儒家们不仅有鲜明的方法论自觉,而且他们的方法论是在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深化的。20世纪西方哲学的新方法层出不穷,现代新儒家并未刻意追随西方哲学的新颖方法,而是在系统整理中国哲学史和创造性发展中国哲学两大历史性课题上耕耘了上百年,让中国哲学史呈现出了清晰的逻辑形式,在新心学和新理学两大方向上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创新性发展。现代新儒家们的方法论自觉完全融入了他们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工作之中。上文所讲的现代新儒学的方法论是从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著作和创造性理论著作中总结出来的,是从他们的治学与为人历史中概括出来的。

现代新儒学的方法论是理解现代新儒家理论成果的一把钥匙,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创新自然不能绕开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成果。消化现代新儒家的论著,超越现代新儒家的理路是当前继承和发展中国哲学的重要任务。总结现代新儒学的方法论是走近现代新儒家的关键一步。从返本开新的方法可以深入理解现代新儒家们的民族文化立场,理解他们所阐扬的民族文化基因。从借西释中的方法可以理解现代新儒家们所揭示中国文化的特质及他们所理解的现代性。从知行结合的方法有助于理解他们所重视的内圣之学的特色。

#### 参考文献:

- [1]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3]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
- [4]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3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5]张君勱.新儒家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6]方东美. 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 [7]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M]. 马镜泉,编校.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8]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5-19(2).
- [9]熊十力. 熊十力全集:第2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10]熊十力. 新唯识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1]杜维明. 一阳来复[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 [12]杜维明. 杜维明文集:第5卷[M].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 [13]张君勱. 张君勱集[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 [14]郑家栋. 现代新儒学概论[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15]方东美.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16]成中英. 创造和谐[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 [17]赵德志. 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 [18]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2卷[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 [19]唐君毅. 自序(二)[M]//唐君毅.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20]成中英. 论中西哲学精神[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1.
- [21]熊十力. 熊十力全集:第4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22]蔡元培,等. 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M]. 北京:三联书店,1990.
- [23]郭齐勇. 熊十力传[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 [24]郭齐勇. 熊十力思想研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 [25]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8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 [26]汪东林. 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 [27]胡昭曦. 四川书院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 [28]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6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 [29]钱穆. 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0册[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 [30]刘述先. 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On the Innovative Method of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

JIN Xiaofang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Neo-Confucianism steps on the historical stage i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fierc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cultures and Western ones, ancient cultures and modern ones. They adopt such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methods as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and opening up the new, interpreting Chinese thoughts with Western ones, and combining knowledge with practice, which promote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The method of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and opening up the new is helpful to deeply analyze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The method of interpreting Chinese thoughts with Western ones is helpful to recognize the special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o learn from the resources of Western culture.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knowledge with practice is helpful to stick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 as life knowledge. These theoretical methods provide a direct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odern Neo-Confucianism; return to the original and open up the new; interpret Chinese thoughts with Western ones; combine knowledge with practice

(责任编辑 雪箫)